



古典文学作品解析

上 輯

古典文学作品解析

上 輯

中華書局

古典文学作品解析

上 韓

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廣平路141號)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860×1168 耗1/32·7 11/16印張·166,000字

1958年7月第1版

1958年7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2,000 定價：(7) 0.80元

統一書號：10018.58 58.7, 漏型

出版說明

这里，基本上按照 1956 年印行的高級中学《文学》課本所选的古典文学作品，及其排列順序，輯集了相应的闡釋和分析的文字，提供給中学文史教师、大学文史科学生以及爱好古典文学的讀者作为参考之用。上輯所收文字，自《詩經》到《唐傳奇》为止。《文学》課本对古典文学作品部分的排列，是以史的先后为序的；因此，这里所提供的文字，不仅有助于对选文的理解，而且也通过对作品和作家的解析，約略給了讀者一个我国文学現象的史的概念。

限于篇幅和材料，不能做到《文学》課本所选的作品篇篇都有解析文字。例如，在《詩經》的篇題下，《文学》課本选了《关雎》等六首；而这里，只能选入一篇概述《詩經》的文字和一篇对于其中之一首：《氓》的分析。有的选文，如《論語》和《孟子》，由于沒有适当的分析选文的文字，只能选了一篇概述《論語》和《孟子》两書的文章。《左傳》一課，則因連适当的概述文字也找不到，就不勉强求全了。

所选的文字，不論討論的角度，剖析的深度，都不完全一致：有的是对于作品和作家的泛論，有的主要从作品的思想內容着眼，有的則側重于表现方法乃至文学語言的例証的分析，甚至有針對傳記文学而发的史实的釋疑。大部分具体分析作品的文字都比較淺显，近乎書面的串講，但也有不少篇，对作家和作品

作了比較深刻的研究性的論析。為了適應比較廣泛的讀者，使能各取所需，這也許有好处，所以也不強求統一。

有一點意見，我們覺得必須向讀者指出：這裡所選的文字，在論析古典作品時，比較着重於內容的積極意義和形式的卓越之處的闡述，這原也是實事求是的，在我們豐富瑰麗的文學遺產中，確實存在着足資我們吸取的進步思想和值得我們師法的藝術造詣。但另一面，由於那些偉大的古典作家所處時代和社會條件的限制，他們不可避免歷史所加給他們的局限，他們的作品中，在今天看來或多或少夾着過時的、不完全健康的因素；對這方面的深入細緻的分析批判，本書所選的文字中做得比較少。當然，以有限的篇幅要求分析得全面、周詳，是不可能的，這還有待讀者用自己的理解，自己的思想勞動加以補足。

此外，還有若干議論，是今天學術界尚未最後解決的問題，例如，陶潛的創作方法究竟是現實主義的呢，抑或屬於浪漫主義的？對於“現實主義”這個概念本身應該具有那些內涵？都還有待進一步的討論。對每一個具體作家和具體作品，牽涉到這一類的問題很多，決不是這一冊選輯的文字所能解決；而解決這些問題，也不是我們這一選輯的目的。這也有待讀者從其他方面求得進一步的理解。

我們做這樣的選輯工作還是初次，一定有許多疏漏和缺點，敬希專家和讀者不吝指正。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58年6月

目 次

出版說明·····	(1)
略談《詩經》·····	程俊英 (1)
《詩經》《氓》的藝術表現·····	何 純 (12)
《論語》和《孟子》·····	邵 真 (17)
略論《楚辭》·····	馬茂元 (27)
談《國殤》·····	黃志輝 (43)
從《觸鬻說趙太后》看說話的技巧·····	陳覺生 (48)
談《馮諼客孟嘗君》的句法和虛詞·····	劉 銳 (53)
司馬遷善于靈活地運用虛詞·····	桂秉權 (64)
談《魏公子列傳》志疑·····	朱東潤 (73)
樂府詩·····	王 璠 (77)
試論《陌上桑》·····	胡人龍 (84)
介紹《孔雀東南飛》·····	余冠英 (92)
論《古詩十九首》里的四首·····	馬茂元 (98)
曹植和他的詩·····	黃星軫 (109)
論陶詩·····	譚不模 (117)
《搜神記》的初步分析·····	劉叶秋 (134)
試論《世說新語》·····	劉叶秋 (152)
南北朝樂府中的民歌·····	王運熙 (166)
唐詩·····	王 璠 (179)

談孟浩然《过故人庄》·····	林 庚 (200)
王維詩簡論·····	邓魁英 (205)
杜甫《羌村》三首·····	王季思 (214)
白居易的諷諭詩·····	邓潭洲 (222)
讀《柳毅傳》·····	王运熙 (231)

略談《詩經》

程 俊 英

我国文学在周代以前，有神話傳說、甲骨文卜辞、《易經》爻辞，还有后人追記的原始社会詩歌；但是，用充分的文字来記錄創作，只能从周代开始，而中国文学光輝燦爛的第一叶，便是《詩經》。《詩經》不但是祖国文学的源泉，是祖国三千年来文学史现实主义起点；而且是世界上最早最有价值的一部詩歌总集。

《詩經》在孔子时有两个名称：一个是單称为“詩”，《論語》說：“不学詩，无以言。”一个是举《詩經》三百零五篇的成数，称为“詩三百”，《論語》說：“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。’”到汉以后，又有三个名称：一个是“詩三百篇”，司馬迁《报任安書》說：“詩三百篇，大抵賢圣发憤之所为作也。”这不过是在《論語》“詩三百”下，加一“篇”字罢了。第二个是《詩經》，“經”本是古时編竹簡的綫名，古人用它代表一切書籍的名称，如《庄子》《天运》：“丘治詩書礼乐易春秋六經。”汉人引申經字的意义，当作常法用。到汉武罢黜百家，提倡儒术，把孔子所整理过的書称为經，在建元元年成立五經博士，称六艺为六經，《詩經》的名称从此流播渐广。第三个名称是“毛詩”，《詩經》经过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后，汉时保存研究的有四家，就是“鲁、齐、韓、毛”。魯人申培的魯詩和齐人轅固的齐詩都失傳了，韓嬰的韓詩只存

《韓詩外傳》；我們現在所讀的《詩經》，是漢毛亨毛萇傳下來的，毛亨所作的詩注，叫做《詩故訓傳》，所以後人又稱《詩經》為“毛詩”。

《詩經》作品的產生時間：書中有年代可考的，最早的是周公東征的詩歌，如邶風《破斧》說：“周公東征”，可証它確是公元前1115年的作品。最晚的一首詩，為陳風《株林》，（王夫之說《詩經》最後一首詩是秦風《無衣》，後已有人証王說不可信。）《株林》是諷刺陳靈公和夏姬戀愛的事，陳靈公在魯宣公十年被殺，是紀元前595年，比孔子的誕生，才早50年。因此我們說《詩經》是包括西周初到春秋中葉500多年間的詩歌。至於每首詩的產生時間，有的我們亦可考其大略，如衛風《氓》，詩中兩處提到淇水，據《左傳》閔公二年：“狄入衛……宵濟衛之遺民”，衛人自狄人入衛，就離開了淇水，那是紀元前660年的事。又《左傳》成公八年，魯季文子曾引用《氓》第四章後四句詩，成公八年是紀元前583年。因此我們說《氓》是紀元前660年前的作品。又如魏風《伐檀》，魏國在晉獻公十六年亡於晉，那是紀元前662年的事。清人崔東壁《讀風偶識》說：“魏風僅七篇，然讀之，興亡之故，如指諸掌。……賢人去，則在位者盡不肖，美不素餐者，正以見卿大夫之皆素餐也。豈唯素餐而已，方且利民以奉己，縱奸以殃民，民不聊生，而皆有去志。所以晉師一至，不復有御侮之人而魏遂亡也。”他從詩的內容，看出《伐檀》、《碩鼠》作於魏將亡的時代，殊為確當。至於王風《君子于役》，朱熹《詩經集傳》說：“王謂周東都洛邑，王城畿內，方六百里之地……幽王嬖褒姒，生伯服，廢申后及太子宜臼，宜臼奔申，申侯怒，與犬戎攻宗周，弑幽王于戲，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，是為平王，徙居東都王城……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。”則王風皆

为平王东迁紀元前 700 年后的作品。这样看起来,《氓》、《伐檀》、《君子于役》可能都是春秋时代的作品。

《詩經》的产生地区:按十五国风,就是十五个不同地方的乐歌,它所包括的地区,有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和湖北北部,这都是以黄河流域为主的中原地区,也是当时周代政治势力所能統治的地方。例如卫在現在河南北部,都于朝歌,《氓》是淇县淇水附近的一首民歌。魏在今山西芮城县,陈奂《詩毛氏傳疏》“汾沮洳”疏:“地理志云,魏在晉之南河曲,其詩曰‘彼汾一曲’‘實諸河之側’,盖汾晉水也,魏北汾西河,汾逕西南而入于河,則汾曲即河曲矣。”可見《伐檀》是山西芮城河曲旁的一首民歌。

《詩經》的作者:《詩經》大部分是民間的口頭創作,其中有集体的歌唱,就无法知其作者,如《伐檀》可能是一些伐木造車工人集体劳动的抒情詩。《氓》是弃妇之詞,《君子于役》为思妇之詩,由其思想感情好象代表許多妇女說出心中所要說的話,故能广播于民間,成为集体的創作。《詩經》还有一部分詩是貴族的作品,它們作者的姓名,見于古書的,例如《尚書》說周公作《鸛鳴》,《左傳》說許穆夫人賦《載馳》。其次是作者在詩里提到自己的名字的,例如《节南山》里的家父,《巷伯》里的孟子。这些都比较可信。至于汉代經学家的說法,如詩序說《燕燕》为卫庄姜作,韓詩又說它为卫定姜作。崔东璧說:“余按此篇之文,但有惜別之意,絕无感时悲遇之情:而詩称‘之子于归’者,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,未聞有称大归为于归者,恐系卫女嫁于南国,而其兄送之之詩,絕不类庄姜戴嬀事也。”崔氏辟經師之說,按詩的內容,分析其作者,語尤精确。又如《伐檀》,魯詩說:“《伐檀》者,魏国之女所作也。”按古代女子不任工匠的劳动,非亲尝其苦者,恐不会发出这样激昂慷慨帶有强烈憤怒性的歌唱,汉代經学家的

說法是不可靠的。由上看来,《詩經》的作者,有劳动人民,有貴族,它是周代不同阶层的創作总集。

《詩經》分为风、雅、頌三大部,风又分为周南、召南、邶、鄘、卫、王、鄭、齐、魏、唐、秦、陈、桮、曹、豳十五国詩,共 160 篇。雅分为小雅、大雅,共 111 篇。頌分为周頌、魯頌、商頌,共 40 篇。总共 311 篇。不过,小雅里有六篇只有調子而没有詩,现在只存篇名,叫做笙詩;所以《詩經》实际上只有 305 篇。

什么叫做风、雅、頌? 古人按什么标准来分类的? 汉代以来的学者对此有几种不同的看法,我个人同意以音乐观点分类說。原来周統治者派人到民間采集詩歌,主要目的是采取民間乐調来充实庙堂音乐。《詩經》的分类,可能是太师根据乐調来分的。风、雅、頌都是音乐的名称: 风是地方的乐調,大雅《崧高》說:“其詩孔碩,其风肆好”,这是說他詩的内容意义极偉大,它的土調儿极好听。《左傳》成九年:“晉侯覲于軍府,見鍾儀,問之曰:‘南冠而縶者誰也?’有司对曰:‘郑人所献楚囚也!’使与之琴,操南音……范文子曰:‘楚囚君子也,乐操土风,不忘旧也。’”这里范文子所說的“土风”,即指“南音”而言,是称赞鍾仪演奏自己乡土的調子。《山海經》:“太子長琴,始作乐风”注:“风、曲也。”可見风詩是用地方乐調歌唱的詩歌,好象現在的申曲、紹興調一样。雅是秦地的乐調,秦是周故都,在今陝西。雅字說文作“鴉”,“鴉”、“烏”古同音,烏烏是秦調的特殊声音,被人公認為周代的正声。《左傳》昭二十年:“天子之乐为雅”,是雅用周都城乐調歌唱的宮廷燕饗乐歌。据朱熹說:小雅是周貴族小燕会用的乐調,大雅是大饗禮用的乐調。雅有大小之分,故亦称“二雅”。頌是舞曲,頌字古时和容字相通,《管子》《国頌篇》注:“頌、容也。”《詩大序》說:“頌者,美盛德之形容,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。”

可見頌詩不但用皇家的樂調歌唱，而且帶有扮演舞蹈的。周頌是周統治者祭祖祭神的舞曲，魯頌是春秋魯人歌頌魯僖公的舞曲，商頌是殷商后代春秋宋人歌頌祖先的舞曲，亦稱“三頌”。（商頌是周代的作品，可參閱王國維《說商頌》一文。）

賦、比、興是後人對《詩經》表現手法的歸納：“賦”是鋪敘，直接陳述某種事理，例如豳風《七月》是周代奴隸敘述一年十二月辛苦勞動的過程。“比”是比喻，用比喻來說明事理，例如魏風《碩鼠》，用田里貪吃的大老鼠，比殘酷剝削的奴隸主。“興”是起興，是詩人接觸到某事物有所感而發，例如《關雎》的作者，聽見雎鳩鳥在關關的叫，叫着追求它的伴侶；詩人聯想到自己所追求的那位采荇菜的漂亮姑娘，就把最近夜里翻來復去失眠的痛苦，幻想同她談情結婚的快樂，寫成了一首詩篇。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引李仲蒙說：“敘物以言情，謂之賦，物盡情也。索物以託情，謂之比，情附物也。觸物以起情，謂之興，物動情也。”他這幾句簡要的話，卻能把賦、比、興的特征，說明得很清楚。

《詩經》是怎樣搜集起來，成為現在的本子呢？根據《詩經》的內容，知道其中一部分是周代保管樂章的太師，他所保存的貴族的燕饗和祭祀的樂歌；一部分是到民間去採集來的口頭詩歌。又據《國語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何休公羊注》等書，說周代設有採詩的專官，官名叫做“行人”或“遘人”，到民間去採詩，採到以後，把詩交給太師，太師把詩歌和調子彈唱配合一下，就上報給天子。採詩的目的，據說有兩個：一個是觀察民間的風俗，借以了解政教的得失。一個是利用民間的小調，來充實貴族祭祀燕會的樂章。《詩經》三百篇，就是在周統治者這兩個要求下而保存下來的。到了春秋時代，諸侯間的交際頻繁，一般外交家為了鍛鍊自己的口才，加強他們外交的辭令，常常引用詩歌的章句，來

表达本国或自己的态度和希望，使其語言含蓄婉轉而又美丽。所以孔子說：“不学詩，无以言”。周詩可能在春秋士大夫訓練口才的普遍要求下，便結成了一本教科書。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是春秋時代最可靠的史料，其中引《詩經》的句子，約有250條，95%的詩都見于《詩經》，可見當時已有固定的本子：那麼，司馬遷的孔子刪詩說，也不能成立。孔子說：“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”，孔子對《詩經》曾作最後核定樂譜的工作，他在正樂方面是有相當功績的。

《詩經》原來的分類，是根據音樂的性質分為風、雅、頌的；但我們現在研究《詩經》，最好依詩的內容來分類。茲按現在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意見，約分為下列幾類：第一類是反映周代人民勞動生產的詩，如《芣苢》、《七月》。第二類是周代人民反剝削反迫害的詩，如《伐檀》、《碩鼠》。第三類是反映周社會喪亂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詩，如《正月》、《北山》。第四類是反映徭役征戰的詩，如《東山》、《君子于役》。第五類是反映戀愛生活的詩，如《將仲子》、《氓》。第六類是周種族史詩和祭祀歌頌祖先的詩，如《生民》、《良耜》。第七類是其他，如賀婚的《桃夭》，送別的《燕燕》。由此可見《詩經》題材的廣泛性了。

《詩經》為什麼被後人視為祖國文學的源泉呢？主要因為《詩經》富於現實主義的精神。當我們讀完一部《詩經》，有一個深切的感覺，那就是好像看見了周社會的整個面貌，了解了那時人民的生活、思想、感情和願望；又好像讀了一部周代從後稷到春秋中葉的發展歷史。當我們讀完《七月》，知道這是奴隸們將自己一年十二月辛勤勞動的項目，悲慘的生活，和自己嗟嘆悲傷的情緒，作了分月的、鋪敘的描繪。從這一幅活生生的奴隸生活圖畫里，我們清晰的看到兩種形象，一種是當時奴隸的形象，一

种是当时奴隶主的形象。从这两种形象里，不仅可以看出他们两种不同的生活，而且反映了当时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。他们两种生活怎样的不同呢？男的奴隶要替奴隶主种田、种菜果、修建房屋、打猎、造酒、藏冰；女的要替他们采桑、养蚕、织绸布、染成各种颜色，为公子们制衣裳，而自己却是“无衣无褐”、吃苦菜、住破屋，永远免不了饥寒的磨折。女的还要被那些好色的公子们带回去玩弄作乐，所以诗里讲：“春日迟迟，采芣祁祁，女心伤悲，殆及公子同归。”在这一幅真实生活的图画里，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当时的生产者是最苦的人，而一些只知享受的寄生者，那就是残酷而又淫乱的奴隶主。诗人用客观的叙述事实的方法、生活的对比、按月分歌唱的形式、素描的手法来描写，从而揭露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迫害。但是统治者的藩籬，终久要被人民冲破的，《伐檀》、《碩鼠》就是周奴隶反剥削反压迫的代表作。《伐檀》是一些工人在河边砍伐檀木，替奴隶主造车，在劳动辛苦的时候，发出不平的呼声。他们尖锐的提出两个问题：一个是“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？”一个是“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县貆兮？”就是说你不种地，怎么收聚到三百房这样多的粮食？你不打猎，怎么我看见你院子里挂有小狐皮？这两个问题的提出，并不是什么大家不懂或者要求谁来作答案，而是诗人通过设问的方式，来攻击揭发奴隶主不劳而获的罪行和剥削制度的不合理，从而体现阶级社会里的生产关系和矛盾的本质。最后诗人又用说反话的方式，嘲笑的口气，来讽刺奴隶主不劳动而吃饭的寄生生活，他们说：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”从他们“设问”“反话”的话里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伐檀工人可能同时又是稼穡者狩猎者，他们愤怒的脸孔，憎恨的情绪。他们的性格是倔强的，不是在诉苦乞怜，而是从不自觉中表露了蔑视的态度，激昂

的情緒，仇恨的追問，勇敢的嘲笑，体现出他們強烈的反抗鬥爭的精神和追求“無剝削社會”的願望。詩序說：“《伐檀》，刺貪也，在位貪鄙，無功而受祿……”，黃柏《詩疑辨証》說：“魏俗嗇儉，而此與《碩鼠》皆刺貪，天下惟嗇者最貪，魏風至此，民何以堪乎？”他們都能說出了這首詩的內容實質。至於《碩鼠》產生的社會背景，齊詩、魯詩都說，由於魏國實行履畝稅以後，人民就做了《碩鼠》一詩。什麼叫做履畝稅呢？就是除了要人民種公田之外，又加稅人民私有田的生產十分之一。在春秋時，魯國實行了這種雙重剝削的稅法，魏國可能就在《碩鼠》詩產生前實行的。詩人將奴隸主比作貪吃的大耗子，在詩開始兩句，就叫喚的說：大耗子、大耗子！不要再吃我的莊稼了，我長期的奉養你，你却忘恩負義的不肯照顧我，我們發誓的要離開你，到那沒有耗子的理想國去。奴隸們非常渴望到那沒有剝削的樂土去，因此最後他們又叫喚的說：“樂土樂土，爰得我所！”可是，那個沒有剝削而能安居的樂土，只是詩人的理想，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說：“哼！那里知道竟出乎意料之外，耗子是隨處都有的，樂土縱找遍天下都尋找不出”，所以詩人在末章最後兩句說：“樂郊樂郊，誰之永號！”這就是說，誰去過理想國？只有長歌呼喊來洩憤了。詩中通過借喻象征的手法，呼告、疊詞、復唱的形式，來揭露奴隸主寄生的本質，堅決的想擺脫不合理的剝削制度，到消滅剝削的樂土去，從而體現奴隸們的憎恨、失望與反抗的意識。《伐檀》、《碩鼠》是當代人民思想的集中表現，我們祖國在兩千五百年前，人們就有“消滅剝削的社會”的理想願望，它確具有高度的思想意義。因此，在當時它們所起的作用也是相當大的，由於人民受不了雙重稅的負擔，紛紛逃亡，魏國政權就在公元前662年顛覆了。

我們要知道，奴隶社会的人民負担，除种公田、納稅、打獵、制衣等外，还要替奴隶主服役，主要是从軍或从事建筑；因而破坏了农村生产和家庭生活。《鵲羽》詩人說：“王事靡盬，不能艺稷黍，父母何怙？”《伯兮》詩人說：“自伯之东，首如飞蓬；岂无膏沐，誰适为容？”从这两首詩里，可以看出当时征人的顧慮和他們爱人痛心疾首的情怀。《君子于役》是写征人在外久役，他的爱人殷切的盼望丈夫早些回来：每当黄昏人畜归息的当儿，便是她最想念丈夫的时候，她只看見小鷄进了窩，牛羊下了山，却不見爱人回家来。她不免惆悵的提問的說：我的丈夫什么时候回来啊！他去服役，沒日沒月的，怎能叫我不想呢？只望他在外不要挨餓受渴啊！通过这位思妇設問的悲鳴，从“鷄棲于埘”到日夕“羊牛下来”的层次的晚景的刻划，襯托出思妇时时刻刻期待的心情与不見归人的失望，反映了无休止的服役制度的殘酷性。从思妇“苟无飢渴”的企祝，襯托出她忧虑关切的深情，反映了征人生活的痛苦。以景写情，以思妇写征人，从她口中纏綿搖曳的唱出了人們妻离子散服役的苦悶和憎恨。

《詩經》里还有一部分是恋爱詩歌，自由恋爱結婚，是古代人民生活要求之一，故恋爱詩歌在国风里篇数最多。风詩的恋歌所表現的内容，是多种多样的：《蒹葭》刻划一位在秋天水濱追求他所爱慕的伊人，刻划他可望而不可即的焦急心情。《靜女》刻划一位男子和情人约会久等不来“搔首踟躕”的心情，相見后得到贈物的开心。《鷄鳴》描繪一对青年男女热恋的恐惧心情，反映旧社会礼教輿論的力量。《將仲子》刻划一位善良热情又怕家庭輿論批評的少女形象，她不得不牺牲爱情劝阻情人不要再来，反映出礼教輿論与人們合理的爱情生活的矛盾。但是，有些性格比較坚强的女子，她誓死的反抗家庭，并不为礼教所屈服，《柏

舟》詩人說：那位披着头发的青年，是我理想的匹偶，我发誓不再嫁別人。《关雎》是描写一位在礼教时代能說能想而不能实行的罗亭式的君子，他若和《柏舟》少女相比，未免太遜色了。齐风《南山》說：“取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”，“取妻如之何？匪媒不得”。《周礼》《媒氏》：“中春之月，令会男女，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”这說明了周代的恋爱婚姻，除固定的仲春开放月以外，必須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否則社会上就認為違礼犯法的事。《詩經》情歌所以有价值，就因为它能表現当代人真挚的爱情、合理的要求、大胆的行为、反抗礼教的精神。《詩經》情歌中还有一种值得我們注意的，就是弃妇之詞，以《氓》为代表。詩的中心内容，是通过一位弃妇叙述自己和氓从恋爱、定約、結婚到受虐、被弃的过程，傾訴她悔恨交加的痛苦心情；反映旧社会妇女被玩弄虐待，婚姻沒有保障的悲惨命运和她們的不平。据《左傳》說，那时人的阶级分为十等，第一等自然是国王，第十等是牧人，而妇女是被社会上看作十一等的人，因为牧人也有妻子，他还有打罵驅逐他老婆的权利。《氓》詩人的性格是坚毅而聰慧的，她說出了旧社会只許男子浪蕩不許女子談爱的本質，她不留恋，不乞憐，知道这样做也是无补于事。《氓》詩人的命运，是旧社会妇女共同的命运，她的悔恨呼声，語語打人心坎，博得后世无数人的共鳴，到今天我們讀起来，还有“慷慨有余哀”之感。从上看來，可知《詩經》的内容所反映的現實生活的广度和深度。所以我們說，《詩經》不仅反映了周代整个社会面貌、人民生活思想感情，还可把它当作历史讀，是历史家們認為最可靠最寶貴的史料。

《詩經》为什么被后人認為是祖国文学的源泉呢？这因为在創作方法上，詩人充分的面向社会生活，以广闊的社会现实为題材，反映人民最关切的問題。他們对这些題材，进行精确細致的